



常青藤译丛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哲学的社会学

一种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下)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美] R·柯林斯 著

吴琼 齐鹏 李志红 译



新华出版社

「**世界書局**」出品

THE PHILOSOPHY OF SOCIOLOGY

哲学的社会学

——综合科学的基本原理与理论(下)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OLOGY

【德】· 柯亨 著

曹 逢 甫 译



世界書局

 常青藤译丛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哲学的社会学

一种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下)

[美] R·柯林斯 著

吴琼 齐鹏 李志红 译

新华出版社

荣获1999年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学术著作奖

R·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世界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任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内容简介：

《哲学社的会学》是一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的书。该书展示了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内涵，在1999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学术著作奖。R·柯林斯站在哲学的高度，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追溯古代希腊、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现代欧洲的哲学思潮，提炼出了一种全球化的学术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既避免把观念仅仅还原为社会的影响，又避免还原为偶然的本土意义的建构，作者尤为关注的是人类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定位。本书一经问世，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球学术界引起关注：

“《哲学社的会学》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打算在有空的时候再读一遍，这次将关注的是它完美的结构而不是总概。”

——A.昆通，《纽约图书评论》

“任何一个认真地关注过理解学术生活的社会学家都不能忽视它，R·柯林斯给予社会学的贡献无出其右者。”

——P.贝赫尔，《加拿大社会学杂志》

“这本令人震惊的作品展示了哲学的伟大地区——东方和西方——的几十种研究……就连一般的读者，通过通读全书，也能获得丰富的人文学科知识。”

——L.阿莫，《图书馆杂志》

“《哲学社会学》是一本真正令人震惊的学术著作，它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它为一系列主题提供了丰富的、极具洞察力和挑战性的论见。”

——B.I.舒尔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作者



敲开智者的脑袋

——当代西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

[英]约翰·雷契 著 26.80元

文明的共存

——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

[德]哈拉尔德·米勒 著 21.80元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美]塞缪尔·亨廷顿 主编 29.80元
劳伦斯·哈里森

学术责任

[美]唐纳德·肯尼迪 著 23.80元

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著 22.80元

总统政治

——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

[美]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 著 39.80元

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美]威廉·麦克高希 著 43.80元

创新性思维——实现核心价值的决策模式

[美]拉尔夫·L·基尼 著 25.80元

哲学的社会学

一种全球化的学术变迁理论(上、下)

[美]R·柯林斯 著 88.80元

多样化的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的构建与商业体制的变迁

[美]理查德·惠特利 著 29.80元

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

形成世界的观念(上、中、下)

[英]肯尼思·麦克利什 主编 128.80元

哲学的社会学

目 录

下

- 第十章 世俗化与哲学的元地域性 /675
 - 第一节 学术基础的世俗化/679
 - 第二节 天主教内部的地缘政治与分裂/681
 - 第三节 形而上学领域的复苏/697
 - 第四节 犹太教的千禧论与斯宾诺莎的理性宗教/701
 - 第五节 莱布尼茨的数学形而上学/704
 - 第六节 在宗教宽容的空间中的哲学竞争/709
 - 第七节 自然神论与价值理论的独立/718
 - 第八节 同盟的颠覆/722
 - 第九节 反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和反科学的对立/730
 - 第十节 认识论的胜利/737
- 第十一章 知识分子接管基地：德国大学革命 /744
 - 第一节 德国唯心主义运动/749
 - 第二节 哲学占领大学/773
 - 第三节 唯心主义作为大学革命的意识形态/791

- 第四节 政治危机与外层因果关系/807
- 第五节 大学革命的推广/810
- 第十二章 后革命的条件: 哲学难题的边界/846
 - 第一节 科学哲学边界上的元领域/854
 - 第二节 高等数学的社会创新/858
 - 第三节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主义/876
 - 第四节 维也纳学派的系列斗争/885
 - 第五节 日常语言对逻辑形式主义的反动/902
 - 第六节 维特根斯坦的艰难历程/908
 - 第七节 从数学基础的危机到胡塞尔的现象学/911
 - 第八节 海德格尔: 天主教的反现代主义与现象学运动的交叉/919
 - 第九节 现象学运动的分化/926
 - 第十节 欧美意识形态的分裂/930
- 第十三章 作者市场与学院网络: 法国的联系/934
 - 第一节 世俗化的斗争与法国大众哲学/937
 - 第二节 文学与学院的混血儿: 存在主义者/947
 - 第三节 尾声: 前途茫茫/977

第四编 元反思

- 第十四章 观念的社会生产中的系列与分支/983
 - 第一节 我思的重现/983
 - 第二节 作为哲学难题的一神论/989
 - 第三节 数学发现了学术操作的纯粹反思/1006
 - 第四节 从笛卡尔到罗素的形而上学—哲学混合物/1009

结 语 /1018

附 录 /1044

一 同时期创造力聚类/1044

二 我们历史图画的不完全性/1052

参考书目 /1055

人名索引 /1123

主题索引 /1160

第十章 世俗化与哲学的元地域性

教会力量的变化必定会导致学术生活的改变。这是绝大多数学术网络集结的物质基础，而这些网络必然地要对某些机会的终结和其他机会的来临作出反应。学术革命并不只是教会与国家的联盟——这一联盟把权威控制强加于思想之上——破裂的结果。狭义地说，思想解放对创造的影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创造的许多过程仍在权威教会的内部发生，当解放到来时，最极端的自由思想家一般地并不是最有创见的，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科学方面。他们的产品常常狭隘又陈腐，而对哲学建构更为敏感的人来自捍卫宗教的保守分子，或是谨慎的半路出家的人。思想自由是一个奇妙的事，但现实主义的态度就是承认它不是创造的主要动力。

我们也不能把这些重要的变化归之于新教。理由之一就是时间上不对头。路德是 1517 年把他的论纲张贴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的，到 1560 年，各主要的新教派别和各国教会的路线已经形成和确立。但是 16 世纪的思想基本上一直是在旧的道路上行进：人文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经院哲学、希伯来神秘哲学信徒和神秘主义者。重大的哲学重组直到 17 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当然是有一些新教思想家，但他们主要地关心的是神学主题和圣经文本。伊拉斯谟、路德、梅兰希顿、加尔文、施文克菲

尔德和弗兰克在哲学上还构不成一次革命。宗教改革强化了特殊神宠论在思想上的重要性，而对哲学和科学创造发生的抽象层面无甚益处。

新教所集中的论证路线有赖于两个错误的前提：宗教控制天然地与学术创新是对立的，新教比天主教更多自由而更少权威。这第二个前提在 18 世纪以前当然是不正确的。其观点是：在 1632 年伽利略控诉案之后，它已成了新教宣传的一部分。但是 1553 年塞尔维斯在日内瓦也被处火刑；1618 年格劳修斯在荷兰被正统的加尔文教徒判处终生监禁，而后逃到天主教的法国；还有 1693 年在鹿特丹，巴利因受到神学攻击而被解除了在新教学术机构中的职位。由于在英国或德国已出版的学术史一直处于新教视角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没有意识到西班牙 16 世纪末在哲学方面是比英国和德国更重要的创造中心（见图 8.7）。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即伽利略和他在意大利的科学派别乃是以耶稣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网络为基础的，天主教的法国乃是从蒙田到马勒布朗士时代主要的哲学网络的中心。正是通过与这一网络的联系，大多数的局外人——从霍布斯到莱布尼茨——才获得了创造的灵感。天主教的僧侣和牧师包括布鲁诺、康帕内拉、阿尔诺（索邦大学的一位神学家）、马勒布朗士和博絮埃。

在科学领域，这幅图画穿插了更多的天主教—新教路线。哥白尼是一位天主教教会人员，伽森狄和梅森是牧师，克拉维斯和卡维里是耶稣会士，托里拆利和维瓦尼是耶稣会学生，帕斯卡尔是詹森派的皈依者。那些发起数学革命的人——卡丹、塔尔塔利亚、维叶特、笛卡儿、费尔玛——全都是天主教徒。在新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布雷、开普勒、纳皮尔、吉尔伯特、斯台文、斯内尔；哈维也是一位新教徒，他曾在天主教的帕多瓦大学

学习。当我们进入到无形学院的一代人时，还能看到新教更为自觉的同一性，这在英联邦时代一点也不奇怪；但这个群体的构成一般地是清教方面的温和派和反对派，他们在结构上与大陆的天主教敌人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这一过长的比较应当能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认识，即科学在神学上是中立的。在穆斯林当中，实际上所有的神学派别都参与科学实践。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我们发现，科学主要体现在维克托里派、大阿尔伯特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司各脱主义者和唯名论者的世界观当中，其中还有阿维罗伊主义者 and 他们的迫害者皮克汉姆；实际上，要找出一个重要的、不给科学留出余地的哲学家是很难的。在希腊人当中，科学与智者学派、柏拉图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主义甚至某些医学怀疑主义分支是兼容的。科学并非必然地是神学的对立面，许多不同的哲学阵营都能容纳它。

当然天主教教会总是以权威自居，我们在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对犹太人的迫害、1592年宗教法庭对德拉·波塔的作品查禁、1600年布鲁诺的火刑、1619年阿维罗伊主义者瓦尼尼的火刑、1613-1616年伽利略受监禁和1623年受指控中可以看到这一点。类似的故事充斥于那个世纪：耶稣会士追捕伽桑狄和阿诺尔德，博絮埃在17世纪80年代对雄辩家理查·西蒙和神秘主义者费尼龙和麦米的指控，古雍在17世纪90年代的遭遇。但是这些冲突也激发了学术创造，天主教世界内部的许多创新就是基于内部冲突的持续制衡。因而，德拉·波塔——根本不是局外人，而是一个耶稣会兄弟——在1598年被迫删除了书中的索引，可接着在17世纪初，他又加入了德拉·林西在教皇的眼皮底下建立的罗马科学院。哥白尼在1599-1626年被西班牙人囚禁于那不勒斯；他逃跑后，正是教皇把他送到法国受皇室保护。伽利略先是

受到罗马的款待后又受到它的警告；他的论断不久便使自己在家中被捕，也是因为一位贵族的资助，使他能继续自己的研究。在此我们看到天主教内部的各种冲突的力量的矛盾和转换。教会提供了一系列强大的竞争基础，每一种都对自己的思想作了充分的阐述，因此为学术运作提供了空间。

相反，新教世界通常给知识分子极少留下自主的空间。尤其是在宗教改革找到强有力的地方权力作为基础的地方，教会基本上是教条的。加尔文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教会与政治联合的共同体代表着一种极端的高压环境。在此地方的自治意味着控制舆论的手段完全是直接的和即时的。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下面这一事实中的逻辑，即哲学革命的主要前沿不仅是天主教而且来自于那一最为明显地反加尔文主义的部分。如果说笛卡儿—梅森圈子是网络的核心，那么需要注意，它的源头正是它的动力和发源地：当笛卡儿和梅森正在拉夫赖学习的时候，弗朗西斯·弗森乃是那儿最有名的老师，他后来成为国王官方的反加尔文主义的领袖（波平，1979 年第 70 页）。笛卡儿于 1628 年投身于哲学研究，当时他受到法国反加尔文主义的领袖卡丁那尔·布鲁的激励而提出了自己的体系。笛卡儿的武器——用怀疑论证为确定性扫清战场——是从前一代的法国思想家那里继承来的文化资本；在此我们发现蒙田的朋友皮埃尔·查龙，后者不仅是一个怀疑论的信徒，而且是一个好战的反加尔文主义者。在哲学革命的关键时期，更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天主教知识分子扮演着解放者的角色，他们反对把加尔文主义者看做是反知识的强权主义形象。

新教改革是漫长的反教会组织的斗争中——自 14 世纪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又一次行动，这一斗争充满了分裂、反教皇、异端和改革。在某些方面，新教改革是对世俗化的一次反动，因为天主教教会是一个与坚固的民族—国家关系紧张的国际组织，

而新教运动的成功代表着教会的威望开始下降到国家（有时是城市共和国）层次，并因此出现了宗教与政治力量新的联合。在一个更大的组织框架中，新教—天主教的斗争给学术生活的基础增加了另一个冲突的维度；对于那几代人而言，是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占据着利用这一冲突的最佳位置。

第一节 学术基础的世俗化

世俗化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结构上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人关心宗教。宗教运动仍然繁荣，但现在它们成了秘密的运动。世俗化意味着知识生产的控制摆脱了教会的权威。那一权威已经被国家的强制力量击溃了；教会和贵族统治在组织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相同的家族在这两个组织中都有任职；教会财产是贵族财产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教会提供仪式生产的工具，为政治阶层执行仪式。因此，世俗化开始了一种政治革命的类型；和所有的革命一样，其结构的关键在根本上崩溃了，这是精英之间的内部斗争的结果，并因为斗争的不断升级和资源的消耗引发了危机。^①

世俗化是对峙的结果。文艺复兴期间教皇统治本身第一次不知不觉地经历了一次世俗化，因为它不仅是世俗财产的中心，而且是无法控制的世俗债务的中心（首先是来自它的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的位置）；它的松散的网络和它的富有使它成为了派系争斗

^① 比较一下斯科普（1979年）和古尔德斯通（1991年）有关政治革命的一般模式。

的中心和冒险家掠夺的目标。宗教改革把这些争斗和掠夺转向了新的层面——大规模的没收和宗教战争。在每一种冲突类型中，结构形态是相同的：教会与国家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化的教会人士与口头高喊宗教口号的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其漫长的斗争最终消耗了教会的力量，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当斗争在政治运作和妥协中偃旗息鼓的时候，教会的仪式印象和合法化的程度失去了。在社会学的冲突理论中，冲突的消耗和降温过程与原初的动员和分化同等重要。

在宏观层面上说，教会政治的结构情形几是相互交叉的力量相互制约的冲突，是政治联盟和宗教派系的相互牵制。这正是政治对峙的公式，而且随着冲突在这一不稳定的情形中升级，将会导致资源消耗，因为旧的教会—国家最终会崩溃。但是还有一个附加的方面：它也是学术创新的公式，这一公式我们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都见到了：即在关注中心的竞争圈子的相互交叉。在教会衰落和消耗的这个时期，天主教世界乃是学术的中心，因为它仍是世界主义的中心。这正是它对于新教的思想狭隘的国家教会在结构上的优越性；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的核心网络与里查留和马扎兰的巴黎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相互交叉的网络间的力量制衡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发挥了影响。政治化的教会冲突的损耗导致了世俗化，教会在国家中的作用逐渐中立化和衰落，以及教会对知识生产的手段的控制的丧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相互交叉的网络是创造时期的公式。明星们如笛卡儿和莱布尼茨是处于圈子内部的核心人物。观念本身也受到影响：世界主义网络——尤其是政治妥协时期，这个时期特殊神宠理论随着幻想的破灭而受到玷污——向着抽象层面发展，构成了哲学发现的领域。宗教转向了普救论；又一次，如同西班牙的阿维罗伊和迈蒙尼德的情况一样，哲学家提供了一种超

出派系争斗的理性宗教。但是世俗化的结构变迁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没有一个宗教教义，甚至最普救论的教义能够复活传统的受国家支持的信仰一度占据的主导地位。教会的非政治化为知识分子打开了一个探询其困惑的内部空间。哲学从它的暗淡中复苏了，在更高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节 天主教内部的地缘政治与分裂

西班牙之所以成为早期学术复苏的中心，就因为它在天主教世界中第一个建立了伟大的国家政权和强权统治。现代国家结构的创造主要的是地缘政治、军事组织和支持它的内部财政结构的问题。西班牙是第一个实行军事革命的国家，它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和装备精良的部队；与之相伴随的是因国家日益增加的财政需要而使得同贵族地主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宗教组织卷入了双方；宗教审判所、修道院、大学、教会领主占据了西班牙近50%的财富（伍思诺，1989年第34页），自然而然地，贵族为了自身的利益把财产和资源交给政府管理。这一激烈的竞争不是发生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而是发生于上层敌对的组织方式之间；这意味着在教会自身的内部存在各种拥有丰富资源的派系，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知识分子的行动。

16世纪的西班牙正在成为欧洲第一个伟大的帝国，并同时随着伊比利亚诸王国的统一、美国的征服、王朝的联姻和联盟而扩张，使它的领土扩张到了低地国家、奥地利、以及法国东部边界以上的一系列地区。重要的是它扩张到了意大利，在西西里建立了它的宗主权；这是迫于同法国的竞争，后者是另一个伟大

的、强盛的后封建国家。15 世纪 90 年代至 1530 年间，西班牙和法国的军队在米兰到那不勒斯之间进行拉锯战，中途不停地解放和劫掠罗马。教皇被迫组织盟军，也许这正是宗教的中央权威在路德改革的那些年最终瓦解的主要原因。从 1530 年到 1700 年，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被直接并入西班牙，其他地区，包括教皇国以及托斯卡尼和威尼斯，则是别扭地混合有反抗和默许。这是天主教权力内部存在的一个主要裂口，也是那不勒斯突然之间成为知识分子如泰勒西奥、布鲁诺、哥白尼、德拉·波塔等的活动中心的一个原因，他们卷入了抵抗西班牙占领的运动，偶尔以支持教皇的方式。

法国和西班牙在北部因地缘政治的冲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把法国整个地包围起来。低地国家——“欧洲的战区”——相当于转移政治争斗的缓冲地带，这使得它更倾向于以最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方式走向宗教的非中心化。如果我们想到军事力量居然会影响它的宗教正统，肯定觉得这是十分滑稽的；事实上，法国和西班牙巨大的资源使得双方相互牵制，包括它们发布宗教政策的努力。当西班牙最终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领头人时，法国被迫采取支持新教的秘密政策。地缘政治不仅可以说明最强大的国家的统治，而且能够说明敌对国的资源间的关系模式。当西班牙成为天主教专制国家时，法国成为了天主教自由主义的中心。而且低地国家由于全都倾向于加尔文主义的专制主义，到 17 世纪已经成为宗教厌战的中心和超越宗教派系的世界主义运动的源头。

西班牙的学术繁荣

尽管西班牙最终确立了一条强硬路线以推行天主教传统主

义，但这是几代人内部斗争的结果，不过这一斗争也带来了学术创造。西班牙并不是自动地走向反宗教改革的，尤其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军队，并与教皇在意大利的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罗伯特·伍思诺（1989年第26-35、102-113页）已经证明说，领地贵族制是从参与古老的天主教仪式获得其最强有力的合法性的，而这一点在西班牙强大到足以击败新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行动者和遏止彻底走向宗教改革的运动。不过，组织的资源是可变的，尤其是16世纪帝国急剧扩张期间，而与这些组织变化联系最为紧密的人民欢迎新的组合学术资本的方式和新的激发情感能量的形式。这些变化一直被界定为是“天主教的”，这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会制度没有公开的断裂，教会权威没有根本地非中心化。在其他的大部分意图和实践领域，创新已走得很远。

耶稣会是这种创新的主要工具。其活动的组织者是因病从西班牙军队退役的贵族伊那爵·罗耀拉（罗皮兹），他于1522年转向传统的宗教实践：朝圣、说服不信教者皈依、热心地照料病人、个人苦行。随着他的声望的提高，罗耀拉开始变革修士的生活，取消教堂的歌唱队、祈祷、隐居和著名的制服。耶稣会士批评巫术、传说和圣徒崇拜。他们的本意是想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传教士——当时正处在伊比利亚领导下的扩张时期。但是西班牙的大学正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罗耀拉追随时代潮流，热情地招募新会员。他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传教士应受到教会最好的训练，他先是在西班牙一流的大学如阿拉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学习，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于1534年和一帮同仁组织了耶稣会。到1556年罗耀拉死时，耶稣会已有会员1000人；到17世纪已有了600多所学院和大学，成为欧洲最大的教育机构（赫尔〔1953年〕1968年第26-27页；奥马利，1993年第200-242页）。